

三晋古籍丛书

重订新校 王子安集

何林天校注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夜露沾孤鶴
秋水共長天一色



王勃画像(选自《晚笑堂画传》)

重订新校王子安集

何林天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）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0.625 字数：230千字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980册

*

ISBN 7-203-01432-0

I·52 定价：6.15元

新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

豫章故郡洪都新府。洪州分隸。軫鎮接衍。應襟三江。而端五湖。控蠻荆。而引甌越。物盛氣順。龍光射斗。斗之墟。人傑靈靈。徐孺下陳蕃之榻。雄州霧列。俊冢。駟臺。隍枕襄。美之。又宿主盡東南之美。都督閻公之雅望。采戰遙臨。宇文新州之懿範。棧惟暫駐。十旬休沐。勝友如雲。千里逢迎。高才滿席。騰蛟起鳳。孟學士之詞府。湛寬青霜。王將軍之武庫。家君作宰。路出名區。童子何知。躬逢勝饌。時維九月。序屬三秋。涼水盡而寒潭清。烟光凝而暮山紫。嶺巖暎於上。路訪風景。落葉。阿。臨。帝子之長洲。得仙人之舊館。昔臺高舉。上出重霄。飛閣翔丹。下臨無地。雲鶴汀。渚。窮。

前言

——论王勃

何林天

一、关于王勃的生卒年问题

王勃的生年，史无明确可靠的记载。近人也是众说纷纭。有的说生于647年（谭丕模：《中国文学史纲》），有的作648年（郑振铎：《中国文学年表》），有的作649年（文研所编：《中国文学史》）。这些说法，也各有一定根据。据《旧唐书》王勃传：「上元二年，勃往交趾省父。……渡南海，堕水而卒，时年二十八。」依此推算，应生于贞观二十二年，即648年。主张生于649年的，是根据杨炯《王子安集序》。杨序说他死于「上元三年秋八月」，「春秋二十八」。依此推算，应生于贞观二十三年，即649年。这些都与王勃自己所说的不符。王勃在《春思赋》中说：「咸亨二年，余春秋二十有二。」依此推算，他应该生于永徽元年，即650年。他

在《游山庙序》中也说：「吾之有生二十载矣。」王勃西南游巴蜀，他在《入蜀纪行诗》中说：「总章二年五月癸卯，余自长安观景物于蜀。」总章二年他是二十岁。依此推算，也正是永徽元年。由于新、旧《唐书》及杨炯有关王勃卒年的记载都有错误，因此，一些研究者据此而推算出来的生年，当然也是错误的了。

关于王勃的卒年，史籍所载，也是有错误的，而且谬说流传，几乎掩盖了历史的真相。《旧唐书》说他「上元二年」往交趾省父，「堕水而卒，年二十八」。《新唐书》说他「渡海溺水，瘁而卒，年二十九」。两种记载都有很明显的矛盾。因为如果说他卒于上元二年，那么只活了二十六岁而不是二十八岁；如果说他活了二十八岁或二十九岁，那么死年应是仪凤二年或仪凤三年。杨炯说他「春秋二十八，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。不改其乐，颜氏斯殂，养空而游，贾生终逝」（《王子安集序》）。这同样有问题。首先王勃二十八岁时不是上元三年而是仪凤二年。在仪凤二年，他还作有《与契苾将军书》。契苾何力死后，其子左鹰扬卫大将军契苾明托王勃为他父亲撰写碑文，王勃为此写了这封复信。契苾何力卒于仪凤二年。《旧唐书·契苾何力传》云：「仪凤二年卒，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，谥曰烈。」就算这封信写于「秋八月」王勃临死之前，那么《王子安集》中还有不少仪凤二年以后的著作，这又怎么解释呢？如《游冀州韩家园序》，文中写明作于「大唐调露之元年」。仪凤四年（679年）六月改元为调露元年，这时王勃已是三十岁了。不仅如此，在永淳二年（683年）的春天，王勃还写了文章。《王子安集》中有篇题为

《三月上巳被禊序》,文中说:『永淳二年,暮春三月,迟迟风景,出没媚于郊原;片片仙云,远近生于林薄。』永淳二年为683年,这时王勃已是三十四岁了。我怀疑杨炯《王子安集序》中,『春秋二十八,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。不改其乐,颜氏斯殂,养空而游,贾生终逝。』这段话中,在『秋八月』一句之下一定还有阙文,因为『不改其乐』与上句是无法衔接的。

那么王勃究竟死于何年呢?我认为王勃死于文明元年即公元684年,活了三十五岁。王勃的叔祖王承烈的祭文可以为证。上元二年(685年)王勃往交趾省父途经浔阳时,写过《致族祖王承烈书》。这封信见于罗振玉抄自日本的《王勃佚文集》(原稿藏北京图书馆)。信中说:『适知旅泊江浔,人遐路近,聊因翰墨,粗飞数行。乙亥仲秋月廿有九日,寓言使至。』王勃死后,这位族翁曾作文致祭。有《族翁承烈致祭文》,罗振玉作为附录收在《王勃佚文集》中。祭文说:『文明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族翁承烈遣息素臣,致祭族孙虢州参军之灵曰』。因此,可以断定王勃死于文明元年八月。上元二年王承烈的寓所离浔阳不远,王勃与他在旅行中尚且有书信来往,死后致祭,是合乎情理的。王勃究竟死于何地?葬于何地?因限于史料,目前还弄不清楚。从《三月上巳被禊序》中,可以看出他流露了一个方外人的消极思想:『观夫天下四方,以宇宙为城池,人生百年,用林泉为窟宅。』他被禊的地方是:『琴台寥落,犹停隐遁之宾;酿酒荒凉,尚遏逢迎之客。……他乡易感,增凄怆于兹辰;羁客何情,更欢娱于此日。』看来王勃晚年曾在江南过着一段为时不短的隐居生活,否则就谈不上什么『羁客』了。王承烈在文明元年(684

年)八月二十四日致祭，应该是距王勃死后不久的初祭，如果是死后的某一个忌辰致祭，祭文中应该是有所说明的。杨炯说王勃死于「秋八月」，这与祭文也是符合的。我认为杨炯所说的「上元三年」，应是「文明元年」之误。这个错误该不在杨炯，可能出自后人的误抄或篡改。要是没有王承烈的祭文，王勃卒于「上元三年」之说，只好永远承讹了。有了这个铁证，就可以纠正史传之误，而且对《王子安集》中调露元年、永淳二年诸篇，也就好理解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同时代的杨炯并没有说王勃堕海而卒，只是到了几百年以后的新、旧《唐书》，才说出了他的死因。但杨炯的说法与此相反，说他是到达了交趾的：「弃官沉迹，就养于交趾焉。」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两句话理解为王勃赴交趾省亲，半路而死的。所以对新、旧《唐书》关于王勃的死因，很值得怀疑。

二、王勃的家世

王勃出生于一个有高度文化教养的家庭。祖父王通，绛州龙门(今山西万荣)人，是隋代著名的学者、教育家。王通生于开皇元年(581)，卒于大业十三年(617)，只活了三十七岁。他从小勤学好问。据《文中子世家》，他曾向当代的著名学者东海李育、会稽夏瑛、河东关子明、北平霍汲、族父王仲华等学会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等儒家经典。他二十岁游

长安，向隋文帝上《太平十二策》。他主张尊王道，推霸道，隋文帝召见后，有相见恨晚之感。但是，他的《太平十二策》，遭到公卿们的反对，他沉痛地写了《东征歌》，慨叹『志乖愿违』，『道之不行』。《文中子世家》说他没做过官，从此就回到故乡龙门从事教育和著作事业。杨炯在《王子安集序》中，说他当过『蜀郡司户书佐、蜀王侍读』。应从《文中子世家》。

王通的思想主要是以儒学为主的儒、佛、道三教合一的思想。这是反映了隋朝南北大统一的思想的。他的『守道不仕』，是由于对当时的政治不满。暴君隋炀帝弑父即位之后，对外侵略，对内横征暴敛，以满足个人的奢侈，而人民却过着『煮土而食』的悲惨生活。尽管统治阶级用高官厚禄去笼络他，他坚决辞官不就。他以孔子暮年讲学自比，潜心于自己的著作。王通的刻苦学习与思想，以及他的『守道不仕』的情操，对于王勃是有深刻影响的。杨炯称颂王勃说：『富贵比于浮云，光阴逾于尺璧。』王通的著作有续诗、书、礼、乐，他还修元经，赞易道。留传下来的有《文中子》。

叔祖王绩（585—644），字无功，自号东皋子。是王通的弟弟，隋末大乱，回乡隐居。唐初，一度做过小官，不久弃官隐居。由于对现实不满，他采取纵酒狂饮、消极避世的对策。在《自撰墓志》中说：『才高位下，免责而已。天子不知，公卿不识，四五十而无闻焉。』他对李唐王朝也无好感，在《赠李征君大寿》一诗中，说：『去去相随去，披裘骄盛唐。』仍然采取不

合作的态度。

王绩的思想对于王勃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。在文学方面，王勃不仅在理论上继承了王绩反对齐梁余风的主张，还用创作反映了自身的遭遇，反映了社会现实。这对于扭转当时的文风，是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的。王绩的退隐思想对王勃也有深刻的影响。这一方面由于王勃有着不幸的遭遇，他的耿介的性格，不愿与恶势力同流合污；另一方面，确实很倾慕自己的祖辈穷则独善其身的守道不仕、退隐田园的思想。他在政治上未受打击的时候，就这样说过：「借如仆者，言不满于乡党，声不出于堂国。东海取乐于簞瓢，南山毕志于文史。餐花佩叶，入兰室而谈元；挹露攀霞，坐松扃而啸逸。扬子云之澹泊，心窃慕之；嵇叔夜之逍遥，真其好也。」（《上绛州上官司马书》）王勃晚期弃官自沉，遨游山水，这与王绩的退隐田园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。

父亲王福时，王通的次子。生卒年不可考。杨炯说他是一个「绝六艺以成能，兼百行而为德」的「人宗」，也是一个具有学术才能的人。他的叔父王凝（贞观时为监察御史，因与杜淹不协，贬胡苏令，后又为太原令），要他整理王通的遗著《续经》、《中说》，他把王通的遗稿辨类分宗，订为十卷，又编订《文中子世家》（有的人说《文中子世家》为王勃所编）。咸亨初因王勃的原因贬为交趾令，以后又当过齐州长史、绛州长史等地方官。

王勃有兄弟六人：王勔、王勳、王勃、王助、王劼、王劝（见《新唐书·王勃传》）。杨炯说他是兄弟五人，没有王劼、王劝，有王勋。王劼早死，还为王勃的《倬彼我系》写过序（见

《王子安集》。王勔在《新唐书》中有韩思彦对他的文才的称赞：「生子若是，可夸也。」可能是杨炯的疏忽，应从《新唐书》。王勔、王勣、王勃小时候都有文才，杜易简称为王氏「三珠树」。《新唐书》说：「少子勔，亦有文。」王勔，当过泾州刺史。王勣二十岁中进士，当过凤阁舍人，后加宏文馆学士，知天官侍郎。王助进士及第，当过监察御史，著有《雕虫集十卷》。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（697），勔、勣、助等都因綦连辉案坐诛。王勃的文章中还提到有一个哥哥王励，但新、旧《唐书》及杨序均不载，可能是从兄。

王福畴是一个很重视子女教育也善于教育的人。几个儿子都在五、六岁时开始学习。他的朋友韩思彦说他有「誉儿癖」，其实他是一个最会循循善诱的人。王勃的母亲死得早，《新唐书》说王助「七岁丧母」，王勃说他自己「养于慈父之手」，可见教育子女的责任，全落在王福畴的身上。王勃少年在长安时，曾听到王福畴启发过他：「一个人不懂医，古人叫做不孝」（见王勃《黄帝八十一难经序》）。他就悄悄地跟长安的名医曹元学医。王勃的刻苦学习，讲求真才实学，不邀时誉，不假势凭时，这与王福畴的教育是分不开的。王福畴晚年习道，「司马谈之晚岁，思弘授史之功，扬子云之暮年，遂起参玄之叹」（《王子安集序》）。王福畴晚年的消极思想，与家庭的连遭不幸是没有关系的。

王勃也是很称颂他的远祖的，他的家世八代以来都讲究真才实学，都是有著作的。据《文中子世家》说，王氏出自周灵王的太子晋，晋的儿子宗敬。据《宰相表》：「其子宗敬为司徒时，

人号曰王家，因以为氏。『二十世祖王殷，当过云中太守，食邑祁，以《春秋》、《周易》训乡里，为子孙资。十一世祖王寓，西晋灭亡时东迁。八世祖王元谟，刘宋文帝时大将，曾北伐，败于滑台。六世祖王虬，『始事北魏，太和中为并州刺史，家河汾，曰晋阳穆公。有大功，天子赐之地，始迁河汾』（《文中子世家》）。王氏定居绛州龙门，始于王虬。四世祖王一，曾任济州刺史，称安康献公。三世祖王隆，字伯高，王通父，王勃的曾祖。当过国子博士，隋开皇年间大教育家，教授门人千余。曾为昌乐令，迁猗氏。著有《兴衰要论》。

王勃的家世，王绩说：『地实儒素，人多高烈』（《游北山赋》）。王虬、王彦都是很有气节，具有高尚情操的人。王勃对自己的家世也引以自骄，当作自己和后代们立身处世的典范。他在《送杨处士太学序》中说：『且吾家以儒辅仁，述作存者八代矣，未有不久于其道而求苟出者也。故能立经陈训，删书定礼，扬魁梧之风，树清白之业，使吾徒子孙有所取也。』王家世代讲究封建道德情操，讲求真才实学，这对于王勃当然是很有影响的。

三、王勃的思想

王勃的思想可以分为早期和晚期。在王勃不曾斥出沛王府，没有遭到政治上的打击以前，属于他的早期，斥出沛王府，特别是官奴曹达案件以后，是王勃思想的晚期。早期的王勃，有着守

忠孝轻名利的思想。他说：『好学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忠孝为九德之源，……审名利为五常之贼。』（《上吏部裴侍郎书》）青年时代的王勃积极关心国家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，自负很高，认为可以『拾青紫于俯仰，取公卿于朝夕。』（《上绛州上官司马书》）当他还是十五岁的少年时，便向朝廷提出了批评性的建议。太常伯刘祥道巡行关内，采访人才时，王勃上书刘祥道，勇敢而中肯地指责了当时政治上的流弊。《新唐书》王勃本传，说他『上书自陈』。这个说法不准确，他不是单纯地为了个人的自荐，而是出于对祖国命运的关怀。他在长达数千言的信中，首先指出了统治阶级连年不断的扩边战争，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。他说：『伏见辽阳未靖，大军频进，有识寒心，群黎破胆。昔明王之制国也，自近及远，先仁而后罚。徵实则效存，狗名则功浅。是以农疏千里，仅逾重石之乡，禹截九州，不叙流沙之境。……辟土数千里，无益神封；勒兵十八万，空疲帝卒。惊烽走传，驮秦洛之耻；飞刍挽粟，竭淮海之费。』（《见》上刘右相书》）他还沉痛地指出：『百战方雄，中国鲜终年之乐。图得而图失，知利而不知害，移手足之病，成心腹之疾。征税屈于东西，威信蹇于表里。』王勃还认为当时商业的畸形繁荣是统治阶级大量的消费所造成的。繁荣的后面是农民遭受严重的剥削，造成了农业的衰落。他指出：『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。何以守位？曰人。何以聚人？曰财。是知发挥地利，农桑启其业；振荡天功，泉贝流其用。……夫补简并用，未尽交易之宜；轻重齐行，适启兼并之路。于是连阏掩阏者，闭肆而乘其屈；布衣韦带者，阖门而受其困。五方竞爽，务浅术以相雄；百郡

争胜，驱末技而成弊。田夫织妇，衣食鲜终朝之给，巨阻洪商，舆马挟封君之势，盖有由来矣。」刘祥道当过吏部侍郎，担负朝廷考试人才之职。据《旧唐书·刘祥道传》，王勃曾向他指出过当时选司的流弊：「今之选司，取士伤多且滥。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，伤多也。杂色入流，不加铨简，是伤滥也。经明行修之士，犹或罕有正人，多取胥徒之流，岂能皆有德行？即知共厘务者，善人少而恶人多，有国以来四十载，尚未刑措，岂不由此乎？」他在《上刘右相书》中，也指出了选才太滥的弊端，以致把真正的人才压抑了。他说：「惜哉！群英雾散，名侯招蔽善之嫌，天下雷同，君子鲜长鸣之地，而欲招绝足，致真龙，难矣！」一个十五岁的少年，针对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，提出这样的见地。无怪乎刘祥道称他为「神童」了。

王勃抱着儒家的入世思想，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。但是，他有耿介的性格，不谄媚权贵，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，只能是「雄略顿于穷途」，「高材屈于卑势」。他的处世哲学是儒家的「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」，表白了——一个地主阶级中下层知识分子对豪族地主官僚的不满。他在《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》中说：「早师周礼，偶爱儒宗。晚读老庄，动谐真性。进非干物，自疏朝市之机；退不邀荣，谁识王侯之贵。」他在《感兴奉送王少府序》中，更表示了对王侯的蔑视：「仆一代丈夫，四海男子，衫襟缓带，拟贮鸣琴；衣袖阔裁，用安书卷。……人贫材富，罔窥卿相之门，貌弱骨刚，岂入王侯之宅。」

王勃因戏作《讨斗鸡檄》而被斥出沛王府时，虽然已开始流露一些消极情绪，但有时也不过

是文人愤激之词。官奴曹达案件，是王勃思想的真正的分水岭。自此以后，他决心「弃官沉迹」，道家的遁世思想，占了支配地位。他被斥出沛王府后，虽然也谈到寻仙学道，但在字里行间，仍然忘不了「唐尧之朝」，「圣明之代」。他在《夏日诸公见寻访诗序》中说：「天地不仁，造化无力，授勃以幽忧孤愤之性，稟仆以耿介不平之气。顿忘山岳，坎坷于唐尧之朝；傲想烟霞，憔悴于圣明之代。」他在《游山庙序》中说：「而事亲多衣食之虞，登朝有声利之迫。」看来他在「衣食之虞」与「声利之迫」的歧路上，还是存在着矛盾的。曹达案件，使他遭到了杀头之祸，统治阶级逼迫他远离朝廷，这时，才使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隐士了。他的弃官沉迹，实际上是迫于朝廷的不用，他在《冬日游汾阴送韦少府入洛序》中说得很明白：「下官诗书拓落，羽翮摧颓。朝廷无立锥之处，邱园有括囊之所。山中事业，暂到渔樵；天下栖迟，少留城阙。」他在《三月上巳被楔序》中完全是一个万念俱灰的隐士了：「观夫天下四方，以宇宙为城池，人生百年，用林泉为窟宅。」他在《游冀州韩家园序》中，明确地以「隐士」、「野人」自喻了。他说：「南庭兴晚，东径阴生。石髓拆而隐士归，玉山崩而野人醉。」他在《忽梦游仙》诗中也说：「流俗非我乡，何当释尘昧。」子安集中有一篇《四分律宗记序》，这是王勃给西京太原寺索律和尚的著作所写的序言，从中可看出，王勃还精通佛学。他说：「弟子才非玄度，识劣真长。本乏凌云之词，虚荷弥天之眷。揄扬盛烈，靡孙绰而多惭；归依胜侣，仰郗愔而自助。」这里他以佛门弟子自居，且以「归依胜侣」自勉。王勃晚年的思想，一方面是个人的宦途失意，加上

他又崇信佛道，使得消极思想逐步的发展。另一方面，也是客观现实的逼迫。高宗晚年，武后预政，朝廷大员甚至诸王、太子可以任意贬杀。当时战争、水、旱，给老百姓带来的是一片饥饿。永淳元年甚至随高宗出巡的扈从士卒也饿倒于途。面对这样的现实，使他的人生更感到悲观失望，因而思想上更趋消极了。他的兄弟王勣、王勣等，后来竟死于武则天之手，他愿意『披萝于山水』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也未尝不是一条明哲保身之计。因此，他同许多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，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，最后终于走上了『弃官沉迹』、归隐林泉的道路。这是王勃的悲剧，也是封建社会这个时代的悲剧。

四、王勃的文学成就

王勃在初唐四杰中，是一个有理论、有创作的杰出的作家。他针对当时以上官仪为代表的浮艳诗风进行了尖锐的斗争，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效。他首先提出了文学的作用：

『论曰：易称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传称言而无文，行之不远。故文章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能事。而君子所役心劳神，宜于大者远者，非缘情体物，雕虫小技而已。是故思王抗言词赋，耻为君子，武皇裁敕篇章，仅称往事，不其然乎？至若身处魏阙之下，心存江湖之上，诗以见志，文宣王有焉。』（《平台秘略论·艺文三》）

在文学的价值上，他继承了曹丕的论点，但结合当时的现实，又作了创造性的发挥。当时的现实是「尝以龙朔初载，文场变体，争构纤微，竞为雕刻。糅之金玉龙凤，乱之朱紫青黄，影带以徇其功，假对以称其美。骨气都尽，刚健不闻，思革其弊，用光志业。」（《王子安集序》）王勃是最先起来反对以上官仪为首的齐梁宫体诗的。由于上官仪地位显贵，他的绮错婉媚的诗风，在贵族文人中竞相效法，时人称之为上官体。他的《八咏应制》就是典型的齐梁宫体诗。对于这种笼罩文坛的歪风，王勃首先从文学的价值上加以否定。他认为这类作品不过是「雕虫小技」，而与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」的真正的文学，是毫不相关的。

王勃在《上吏部裴侍郎启》中，批判了汉代的辞赋，晋代的玄风，六朝的绮靡。他说：「夫文章之道，自古称难，圣人以开物成务，君子以立言见志。遗雅背训，孟子不为；劝百讽一，扬雄所耻。苟非可以甄明大义，矫正末流，俗化资以兴衰，家国由其轻重，古人未尝留心也。自微言既绝，斯文不振，屈宋导浇源于前，枚马张淫风于后。谈人主者，以宫室苑囿为雄；叙名流者，以沉酗骄奢为达。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，宋武贵之而江东乱。虽沈谢争骛，适先兆齐梁之危；徐庾并驰，不能免周陈之祸。于是识其道者，卷舌而不言，明其弊者，拂衣而径逝。潜夫昌言之论，作之而有逆于时，周公孔子之教，存之而不行于代，天下之文，靡不坏矣。」

他以矫枉过正的态度，从枚乘、司马相如的辞赋，到徐陵、庾信的绮靡，进行了严峻的批评，认为这是祸国之源。他同当时的青年诗人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等人，结成了一个新的改革